

从中国留学问题的 “前世”看“今生” ——《近代中国留学史》导读

◆ 桑锦龙

舒新城 (1893- 1960), 原名玉山, 学名维周, 字心怡, 湖南溆浦人, 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 曾长期担任《辞海》主编, 而且一生关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著作颇丰。其所著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学问题的专著, 奠定了中国留学史研究的根基。该书初版于 1926 年, 2011 年 5 月被上海书店出版社纳入“新原点丛书”再版, 以纪念“他们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原点所在”^[1]之重大意义。时光荏苒, 在“教育国际化”风起云涌的当代中国, 认真阅读这本著作, 把握我国留学问题变化的历史脉络, 品味作者的家国情怀, 有助于我们对当前的“留学热潮”进行“冷思考”。

一、“留学问题几乎成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 发达国家 (地区) 教育对于我国青少年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以至于民间有所谓“十年前看北大清华、五年前看港大科大、现在看哈佛牛津”的说法。以“优秀学生出国数量增加、工薪家庭留学学生比例增加、留学低龄化趋势加深”^[2]为特征的我国留学发展趋势, 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教育的发展态势和战略布局, 也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影响。

审视当前我国的留学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 但历史视野必不可少。2012 年是中国对外开放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年份, 它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留美幼童出海 140 周年, 也是中国签署包括教育服务在内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迈入第二个十年的开始之年。也正因如此,

2011 年重新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为我们深入认识当前我国留学热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学问题的专著, 《近代中国留学史》对清同治九年 (1870 年) 到民国十五年 (1926 年) 近 60 年的中国留学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 内容涵盖留学创议、发展阶段、重要专题、留学资格与经费、留学管理和留学思想变迁等, 资料包括中国学生赴欧美、东洋 (日本) 等地区的留学人数和所学科目等, 甚至还对“官绅游历”“贵胄游学”“女子游学”等当下仍“很热”的专题进行了探讨。20 世纪初期, 国家政治纷争不断, 社会动荡, 治学不易, 但作者仍以严谨的态度, 仔细收集分析了有关我国留学问题的林林总总, 逻辑清晰, 资料翔实, 为后辈研究留学问题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其中有关留学生之于国家发展重要性的一些认识对于思考当今中国的留学问题亦有重要借鉴意义。

舒新城认为, 留学生已经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他通过分析清末民初近 60 年的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史, 对近代以来我国留学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即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虽然社会上对于留学生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存在不同认识, 但留学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不争的事实, 以至于作者在书序中感慨: “但在现在的中国, 留学问题几乎成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 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 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 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或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 所影响的事实看来, 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 此时研究留学史或者不尽是急其所缓白费工夫罢!”^[3]

针对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社会中对于留学教育和留学生作用的不同认识和争论, 舒新城强调要辩证分析, 他指出: “近来因为留学生有许多不满人意的的事实示人, 社会对于留学生的观感大变, 责难日多, 激烈者并以为留学教育足以亡国, 因而将留学生之贡献亦一笔抹杀。实则留学生也和其他学校学生一样; 有卖国者, 也有救国者, 对于学术文化有摧残者, 也有贡献者, 不过就其总和之数是说,

瑜不掩瑕，遂致一般人不重视其优点而责难其缺点。我们却当分别观察之。”^[4]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他充分肯定了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科技、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现在的留学生诚然有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但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决不至有今日”^[5]；“留学生在近世中国文化上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大者为科学，次为文学，次为哲学”^[6]。但同时，他又立足当时的中国实际，指出近代以来留学教育存在的诸多误区致使当时的留学生社会观感不佳，认为留学生被社会责难的主要原因包括“留学生为一特殊坐食阶层”“留学生外国化”“留学生植党揽事”，特别是联系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实际，对留学生的社会作用进行了深刻反思：“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以军事，外交，教育为甚：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而曹陆章之卖国，更为国人所嫉视。其他如外交则完全为留学生所主持，高等教育界之人员亦十分之九以上（据民国十四年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留学生，全国重要事业无不有留学生在其中。二十年来国势日趋日下，无论教育，外交，几无一事可以使国人满足，国人对于留学生之不满，自系不可避免的事实。”^[7]

总之，《近代中国留学史》初版距今已有80多年，世事多变，我国留学教育发展也出现了与作者所述60年不同的一些阶段性特征，例如，外敌入侵和政治纷争使留学教育受到很大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前苏联成为我国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文革”期间留学生教育再次受到严重冲击，改革开放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的地的留学生教育开始快速发展等。但无论这些时期我国留学问题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是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全局来看，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对于留学生之于中国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对于今天我们辩证分析留学生教育的定位和意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从历史上说明现在留学问题的因果并想求出一条新路径以引导未来”

舒新城著述《近代中国留学史》的重要目的就是“从历史上说明现在留学问题的因果并想求出一条新路径以引导未来”^[8]，因此，他对于许多历史事实的认为我们认识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例如，派遣留学生不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现象。舒新城指出：“梁启超以中国在千五百年前即有留学生，其事迹可考者且有百余人，则派遣留学生已不自现代始。不过自唐以后，佛教官典已经翻译，宗教界的需要有相当的满足，而且也无玄奘其人含辛茹苦，万里求学，即间有赴印度求佛者，亦为宗教之祈求而非学术之探究。至于西洋因交通关系，在明以前且不会与之通往来，自说不到派员求学。”^[9]

又例如，近代中国留学的原始发动者是容闳而不是其他人。舒新城指出：“说到近代留学的渊源，大家都推重曾国藩与李鸿章，以为他们是首先派遣留学生的人，无他们中国便无留学生；新学术、新事业也不会如此发展。中国政府派遣学生出国求学固然是由于他们，但原始发动者却不是他们，也不是他们所说的丁日昌，而是毕业于美国耶路大学（Yale University）之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曾李丁诸人不过因位高权重而负其名耳。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10]

再例如，1921年（民国十年）在法国里昂设立中法大学是近代中国在境外设立大学的开始。根据《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在吴稚晖、李石曾等的倡导下，经“中华民国”政府及各界赞助，1927年在法国里昂一旧炮台设立了中法大学，最初意为招收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但“后因种种原因，向国内招收学生，但因校舍与经费之限制，学生不过百五十余人。校中有特待生，免费生，正式自费生之分。此事不独在留学史上开一新纪元，且为中国在海外设立大学之始”^[11]。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于留学问题的历史事实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舒新城认为尽管留学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但与历史上仅作为文化交流载体的

留学不同,近代以来中国留学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宿命和特征。他强调,清末民初,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在思考的问题,近代留学问题也应运而生。“自戊戌变法,辛丑图强,以至民国以来,社会上无时不鼓吹游学,政府无时不以游学为教育中之重要政策,都为这些思想所支配。明白说来,中国六十年来游学的思想,可以军备,西政,西艺,西学四项包括之,简单说明如下:此四种思想虽然互相错综,彼此不易划一显然的界线,但亦各有其最高度;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自同治末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第二期自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第三期自宣统元年至民国六年,第四期自民国六年至今。”^[12]简言之,近代以来的我国留学现象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努力密切关联,“军备、西政、西艺、西学”既是清末民初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先后开出的“药方”,也是深刻影响我国留学政策的重要思想和主要内容。

此外,舒新城还认为我国留学现象也有深刻的文化根源或文化特征。“辛丑而后,国人图强之心切,但科举在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科名观念一时无从打破,政府遂不得不以科举的方法奖励游学生,于是游学成为一种工具,学生出国之动机并不在求学,而在藉此龙门以抬高身价。民国而后,科名的奖励虽经取消,而社会上对于留学生与留学生之自视,亦俨然以留学为一种变相的科举。留学生既为此种不正当之动机所趋使,所以在外国不专心于学业,回国不努力于事业,因果循环,遂构成今日留学界虚浮骄纵无济于世之恶果。此则科举思想的遗害而一时难于除去者。”^[13]言犹在耳,环顾当今之留学热潮,不能不为他的深刻洞见所折服。

总之,近代以来的留学问题,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审视,但透过《近代中国留学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最重要的视角就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时过境迁,在《近代中国留学史》初版80余年后、在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当今中国,重新兴起的留学热潮也许有着更多不同的动力,但实现国家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应当依然是

中华优秀儿女出国留学萦绕心头的历史使命。

三、“以后的留学政策当以研求学术,改进本国文化为唯一的目的”

舒新城著述《近代中国留学史》之时,正是中国政治动荡之时,透过全书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伴随着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从20世纪初期开始,留学生就逐渐成为影响我国政治与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留学生的留学所在国、学科等背景都对其政治和社会行为产生影响,整个社会对留学生的历史功过也存在褒贬不一、仁智互现的状况,甚至出现了“洋化亡国”的指责,正如舒新城在书中所言,“留学问题近年已逐渐被人注意,而且毁多而誉少”^[14]。鉴于此,全书也把此方面的分析贯穿始终,试图寻找到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而这其中,留学政策的战略性转变就被置于最重要、最紧迫的地位。作为全书的结论,舒新城在本书的最后写到:“六十年来之留学史至此将告结束,若问所得,只有一言相答,即:中国六十年之留学政策均把受教育当作研求学术,留学界之一切因果均由此观念造成。再问今后之途径如何?亦只有一言,即:以后的留学政策当以研求学术,改进本国文化为唯一的目的。”^[15]换言之,舒新城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对留学生有负面观感、对留学事务指责颇多,不能简单指责或归因于留学生个人,归根结底是政府的留学政策出现了偏差。他指出,“六十年来留学教育之结果竟如此,最重大的原因就是受教育与研究学术混为一谈”^[16]。也正因如此,他为中国留学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指出了方向:应将“研求学术”放在今后中国留学政策目标的首要位置。

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教育特性,舒新城前瞻性地提出了坚持教育主权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强调留学应该是东西方文化双向交流的载体,而不能简单地搞单向输出或文化移植,因为“教育为改进国家最重要的工具,谁也承认。可是一国有一国的立国精神,也有其民族特性”,“所以以教育为改进国家的工具,是用教育的方法昌盛国家,在某种范围以内,中国自然当吸收欧化,西洋也当吸收东化”,“因而一国的教育,都有其针对国家特性

力求改进发扬的特质，凡属该国国民都当受此种教育以期有利于国。这种教育之实施，均当由本国直接负责，不当假手他人；倘由他人代庖，便有发生盲目外国化的危险”。^[17]

也正因如此，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对于我国早期的低龄留学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明确提出反对低龄留学现象和过分功利化的留学目标。舒新城认为，由于教育具文化特性，因此，要防止“留学生外国化”的倾向就必须谨慎对待低龄留学现象。他认为，由于低龄儿童少年对本国文化的学习和把握还远远不够，他们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能力、在留学过程中的文化辨别能力都不强，再加上低龄留学者在国外学习时间较长，虽然对外国社会的适应能力较强，但极易出现“外国化”倾向。他认为这是近代中国60年派遣留学生的最大教训之一：“中国六十年派遣留学生，根本上便不曾认清此点，所以最初派学生，规定年龄在十六岁以下，学年为十五年，使他们受完全的外国教育，后来派遣大批中等学生出国及与日本五校特约，清华学校之美国式的预备教育，毕业生一律出国时种种现象，都是同一病根。留学生既到外国去受教育，一切外国化是应有的结果……”^[18]

作为本书的结论，在对近代中国60年留学历史进行详细梳理、辩证分析的基础上，舒新城为未来中国留学政策指出了新的方向，他提出，与过去单纯去国外“受教育”不同，未来的中国留学政策应将到国外去“研求学术”作为主要目的。他认为，“研求学术”“是自动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虽然因国内之需要与其他关系而出国研究，但研究者对于其欲研究的学科有了明确的目的，且有判断力能吸取精英以为己用，一旦出其学术应用即能对症下药，所以研究者之资格绝非童年或青年，最少当受过适当的本国教育，了解本国国情，对于研究的学术有适当的基础”^[19]。他指出：“无论从任何方面讲，留学均当以研求学术以改进本国文化为目的：因为一国教育之实施本是国家底责任，托人代为一部分国民施教育，在理既不可通，而从数十年经验看来，其结果亦不太如人意。”^[20]以此为基础，他还对当时中国的留学政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建

议，例如，国家应该根据国内学术发展的需要确定派出留学生的名额，派出的留学生应该达到特定的学术标准，自费生名额应无限制但仍需经严格考试（以验是否有专门研究某种学术之能力与改进本国文化之志愿而免冒滥）等。

《近代中国留学史》初版之时，正值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心和意见纷争，也反映在了教育领域包括如何认识留学教育及留学生的价值上。实质上，伴随着日益增多的留学生回归中国，从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一场针对留学教育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派送留学生及留学教育的国别选择问题。争论的实质是：留学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助力还是阻力？造成留学教育问题的原因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争论目的是：探索中国留学教育的方向与道路”^[21]。舒新城作为这场论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所著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反映了这场论战中聚焦的一些热点问题，也反映了作者自身的思索和回答。尽管受制于各种因素，中国留学事业的后续发展并未完全符合舒新城的预期，时过境迁，书中一些认识或结论（如过于强调留学目标的社会本位以及管理主义倾向）也未必适宜当今中国，但在提出并回答中国留学政策不可回避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例如，在如何使留学教育服务于民族及国家的复兴、如何协调好留学教育和国内教育的关系、如何使留学生真正成为既具有民族自豪感又具有国际交往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等方面，《近代中国留学史》的确具有不容错过的“原点”意义，对于认识当今中国的留学热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 [1][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20]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出版说明、序(1)、137、1、138、137-138、序(2)、125、1-2、65、126、136、1、173-174、174、174-175、175、175。
[21] 佚名.高中尖子生“弃考”出国让人忧[N].中国教育报,2011-06-19(02).
[21] 杨晓.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留学教育问题的争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4).

(桑锦龙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博士

100045)

(责任编辑:张 蕾)